我們的部落

純 上

東西走廊

美國立國前，日後國父之一的本傑明富蘭克林曾抱怨總有白人投奔殖民地的印第安土著，曾被土人綁架或收養的白人被「解放」後仍無怨無悔地要回歸部落，但很少有印第安人投奔白人的。爲什麼原始部落能培養出忠心耿耿的成員？《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多次到阿富汗等地親歷戰火的紀錄片製作者江格（Sebastian Junger）認爲，這是因爲部落提供了現代社會所毀滅的東西：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與歸屬感。

在新著《部落》（Tribe）中，他引用人類學、心理學和歷史學資料，揭露現代社會給人們精神與心理層面帶來的巨大傷害。他說，根據「自決」（self-determination）定律，人們需要三種「內在」的東西才能獲得眞正幸福：擁有擅長某事的能力（competency），過着忠實於自我的生活（autonomy），定居在與他人緊密相連的集體（community）。我們能在萬年進化過程中逐漸成人，與其他動物區分開來，一是有賴於食物的分享，二是因爲我們能團結起來，無私地保衛集體。

現代社會儘管物質資源更豐富，生活更方便、安全，人與人之間卻日益疏離。他說，富裕社會中，有人一輩子衣食無憂，一輩子不會經歷危險，私有財產更多，個人選擇更多，但整天甚至整個一生都在和陌生人打交道。心理疾患的發病率，如抑鬱症、精神分裂、焦慮症，隨之上升，自殺率也上升了。他甚至聲稱，美國發生的持槍行兇、瘋狂槍殺十幾或幾十人的案例一半發生在富裕的中上層白人居住區，另一半發生在白人佔多數、犯罪率很低的中西部地區，而不是在犯罪率高的「貧民窟」。

有意思的是，自然或人爲的災害卻能降低心理病發病率，讓我們更「健康」。如，二戰時期德軍對倫敦長達數月的大轟炸不但沒有摧毀英國人的民心，反而讓他們更團結互助，心理疾病發病率和自殺率反倒顯著下降。而二〇〇一年紐約發生「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後，謀殺率下降了百分之四十，自殺率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同樣，颶風「柯翠娜」（Katrina）襲擊新奧爾良市以後，那裏的犯罪率反而降低；所謂「洗劫成風」的媒體報道不實，而且人們搶的多半是吃食。

作者認爲，天災人禍的作用就是讓時光倒流到萬年以前，個人的私心雜念被集體利益控制，因爲沒有集體個人就無法生存。這種親密聯繫正是很多現代人渴求的。也就是說，共同經歷的災難創造了生死與共的群體，類似於原始社會中財產共用，地位平等，集體至上的部落。共渡難關時兩類領袖特別重要。男性型領袖擅長冒險行動，經常成爲犧牲生命拯救陌生人的英雄。女性型領袖則擅長在逆境中鼓勵大家不要喪失希望，能夠堅持自己的道德信念，堅韌不拔，甘當無人知曉的無名英雄。這兩種領袖不一定嚴格按照性別劃分，而是根據實際需要，男女在困境中都可擔負。

此書出版於二〇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揭曉前。當時書評認爲作者揭示了政見分裂的美國社會加劇戰場上歸來的美國軍人的心理疾患：儘管只有百分之十的軍人與敵軍正面交火過，卻有百分之五十的軍人患有「創傷後失調綜合症」。江格控訴：美國社會中針鋒相對、互相蔑視的左、右派讓沒有爲國捐軀的老兵不知如何在和平社會中生存。如今已是二〇一七年，大選塵埃落定，民間分裂卻愈演愈烈。在這種局面下提倡誓死捍衛本「部落」，與敵人勢不兩立就難說是禍是福了。

重口味法國菜

小 雪

花都書簡

「女士，請問您確定要點這道菜麼？」這位年輕帥氣的法國男服務生指着菜單上的名字，先用法語問了一遍，又不放心的用英文再次確認。

「是的，謝謝你。」我微笑着點點頭。

「但是這道菜的口味非常非常重。呃，我的意思是，它包含了很多內臟，像是……你知道，大腸之類的。所以，會有很重的味道，您能接受麼？」

「謝謝你給我解釋，我想試一試，請幫我下單吧。」

「好的，女士。」服務生這才放心的把菜名寫在了點菜單上。

這家餐館坐落在離艾菲爾鐵塔兩三個街口的一條小街上。我慕名而來是因爲遠在西雅圖的好友專門寫了一封e-mail，告訴我說這家店號稱「奧巴馬最喜歡的巴黎餐館」。但更重要的，是他上一次出差到巴黎，兩天時間去吃了三頓，實在太好吃，所以必須推薦給我。而這一次是我第二次來這家餐館，但卻是第一次能有幸品嘗。因爲上一次沒有預定，四個小時之內都沒有座位，我悻悻而回。

這份朋友再三推薦的「重口味」的菜，是把內臟像灌香腸一樣灌到腸衣裏，然後用很重的香料燉製而成的。配料的香味和內臟特有的「重口味」讓這道菜獨一無二，喜歡的人簡直愛得無法自拔，不喜歡的人聞到味道都幾乎要暈過去。所以，這算是一道「愛恨分明」的菜式。

然而，這家餐館的重口味菜式並非僅此一道，他們家的菜單幾乎包攬所有法國人熱愛的「非常規重口味」菜品。比如說，紅酒燉牛頭牛臉肉，連皮帶肉一鍋燉，上菜的時候會連鍋一起端上來；另一道是香煎牛腦，英國人還給它取了個完全不搭邊兒的名字：「甜麵包」。但它既不甜也沒有任何像麵包的地方！至於用豬血做的「黑腸」、燉牛肚、烤蛙腿、豬蹄牛舌、蝸牛兔子鴿子，等等等等，對於吃慣了鵝肝和生牛肉的法國人都算是正常口味了。

先生在這些重口味菜式中選擇了相對安全的紅燒牛臉肉。一個銅質的小鍋端到他面前，頓時香氣撲鼻。看着這一大鍋燉得酥軟的「大肉」，先生露出了相當滿意的神情。緊接着，我點的「重口味」端上桌來，一個大大的盤子裏，簡單粗暴的放了一整根內臟製成的香腸，比我們往常吃的香腸大約粗了一倍，旁邊是一點沙拉和薯條。我切開香腸的那一剎那，內臟的氣味夾雜着各種香料的味道撲鼻而來，坐在對面的先生立刻作出幾乎要暈倒的樣子。我不管他，高高興興的開始大快朵頤。

旁邊桌正準備點菜的一對老夫婦悄悄的探過頭來看我們的菜，然後又看看菜單像是在尋找的樣子。見我看到了他們，老太太趕緊打聽我們的菜分別是些什麼。我在菜單上找到那些菜，指給他們看。好像老兩口都想吃香腸，卻又都想嘗嘗牛臉肉，兩人小聲爭議起來。老太太跟老先生說話的口氣彷彿像有點小爭執的情侶……

噢，法國人的小情趣眞是無處不在。我回過頭，品了一口紅酒，心滿意足繼續我的「重口味」大餐。

我爲外籍僱員當紅娘

潘正秀

人與事

一九九一年九月三十日，中國與文萊決定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當時雙方委任各自國家駐馬來西亞大使兼任駐對方國家大使。爲適應兩國關係不斷發展的需要，一九九三年八月，雙方商定在各自首都互設使館，並互派常駐大使。中國駐文萊使館是按照改革精神，以精兵簡政的原則建立的。國內只給大使配備一名廚師，但可在當地僱用一名大使司機和一名女傭打掃大使官邸衛生，招待客人，打理雜務。

通過華人朋友介紹，我們終於找到一個叫梅希的菲律賓女孩。梅希二十七歲，是家中老大，下面還有一群妹妹，她大學上到最後一年，因家境困難，奉母命輟學，出來掙錢貼補家用。她到我們官邸工作不久，父親去世，她又成了家中掙錢的頂樑柱。這個女孩子，非常單純膽小，平時沉默寡言，但幹活很踏實。大使官邸的房屋結構是，傭人單獨有一幢平房，裏面有兩個單間，一個廚房和客廳。使館司機拉姆與梅希各住一個單間，合用廚房和客廳。對打工者來說這個條件是不錯的，但對於寡男寡女合住，確實有它不便之處。梅希一來就對我說，她害怕拉姆這個彪形大漢。我告訴她，「在請示使館領導和徵得房東同意後，房子結構可考慮進行一些改造，讓你們相互分開。但拉姆這個人是個勤勞、誠實的人，他會幫助你，不會傷害你的」。後來，使館與房東商量後，決定把傭人房隔成兩個小套間，梅希對此感到很滿意，拉姆也不介意。但數月後，梅希一次在打掃衛生時，羞答答地對我說，「媽姆（大媽的意思），我對你說點事，拉姆說他愛我」。一聽梅希的話我感到非常高興，脫口就對她說，「太好了，他是個好人啊，你就和他好吧！怎麼樣？」她低着頭默認。接着，我又調侃了她一番，「房子連在一起，你怕他，房子分開了，你又接受他的求婚了。」梅希紅着臉說，「媽姆，你曾對我說的話是對的（指我說拉姆是個勤勞誠實的人）」。

中國大使官邸司機與女傭結爲伉儷一時在當地傳爲佳話。外交部領導到館檢查工作時，對使館使用外籍人員的做法加以肯定，並指示我們要把外籍人員當朋友，他們的勞動對我們外交工作是個支持。據此，我認爲拉姆與梅希相愛是件好事，一來他們可以互相照顧，二來對使館工作也方便，同時單身的拉姆已三十多歲，到了當娶之年。確實，在以後的工作中，他們配合默契，拉姆不出車時，幫助梅希幹活，打理院落雜務。梅希工作之餘，幫拉姆熨衣，洗衣，做飯。

一九九七年八月，他們爲了不耽誤使館的工作，選擇在我們夫婦回國休假期間到拉姆的家鄉馬來西亞東部地區、鄰近文萊的美里市舉行了婚禮，結爲終身伴侶。婚後，拉姆對梅希更是關愛備至，當然，梅希對拉姆鍾愛之情，也是溢於言表。

每次看見拉姆出車回來，她總是站在門口笑嘻嘻地迎接，如果她在工作，就偷偷看他一眼，或背着我們向拉姆做個鬼臉。拉姆與梅希婚後，一直感謝我，認爲我爲他們相知相愛提供了方便。看到此情景，我不禁問梅希，你們打算什麼時候要個小貝貝？梅希低着頭小聲答道，「這事由拉姆決定。」我心中暗自欣喜，多好的一對！

俗話說，促成一樁美滿姻緣，勝造七級浮屠。我倒是沒那麼大功勞，但是我確實認爲拉姆與梅希是極其班配的一對。拉姆身強力壯，辦事可靠，以館爲家，主人翁感很強。梅希也是個十分聰明的女孩，要說官邸這樣高級的房舍和庭院她見都沒見過，更甭說打掃和管理了。但她上崗後，能努力學習，很快把一個高檔女傭的業務擔當起來，至於迎來送往，端茶送水，宴會的準備，事後的收拾都駕輕就熟了。

我這個人是個很重感情的人，當我們夫婦離任回國時，我對這對爲我們忠心耿耿服務了幾年的外籍僱員夫婦眞是依依不捨，特別是梅希這個溫順善良的女孩，比我的女兒還小，我從來沒把她當作傭人看待，即使偶而有什麼事她幹得不那麼令人滿意，我只是悄悄地向她示範一下正確的做法，而不忍心訓斥她。我知道我一離開使館很難有機會再見到他們夫婦了，因此，當我們夫婦要上汽車前往機場時，我禁不住與梅希緊緊擁抱，梅希兩眼流下了淚水，她不忍心看着我們坐車離開，於是鬆開了我的手，沒等車開掉臉就回去了。拉姆最後開車把我們夫婦送到機場，當我們夫婦進入安全門後，他一直站在外面一個至高點向我們招手。我想這時，我們不是親人勝似親人。我們之間的眞情超越了我們的不同膚色，不同國籍，更是超越了我們之間的僱傭關係。

我回國後，聽說梅希生了一個兒子。他們夫婦抱着貝貝，在官邸門前照了一張相寄給我。當時，我家孫子輩的還沒誕生，我把這個微黑的小洋人當作我的第一個孫兒。梅希後來辭去在使館的工作專門在家照顧她的貝貝，我曾捎信向拉姆與梅希祝福，並託人帶去我在北京親自選購的電動娃娃和幾套兒童服裝給他們的小貝貝，祝賀他茁壯成長，祝賀他們全家幸福安康。

師承的演變之美

——觀夏塞里奧和馬蒂斯特展有感

王 加

藝加之言

在夏塞里奧特展的展品中，並排陳列的《阿波羅與達佛妮》手稿和油畫，《維納斯從海上升起》草稿等作品中的肢體動作，直接讓我的記憶跳躍到了古斯塔夫・莫羅的巴黎故居博物館。在巴黎所有的故居博物館中，莫羅的故居毫無疑問是我的摯愛，是每到巴黎必去之地。自二〇一二年經美國閨密推薦初次探訪之後，古斯塔夫・莫羅便一躍成爲了我最愛的藝術家。顯然，師出夏塞里奧門下的莫羅不僅繼承了老師的創作構圖，嚴謹的人物造型和標誌性的肢體語言，與德拉克洛瓦相識的他更是從德氏身上汲取了豐富濃烈的色彩表現。加之二人對東方風情的鍾愛，莫羅得以在其擅長的聖經故事和希臘神話題材作品中注入極富個性化的歷史感色調、受古波斯和印度細密畫影響的裝飾性細節，以及前所未見的夢幻般異域神秘感。

無論是在夏塞里奧特展中陳列出的莫羅名作《監獄中的莎樂美》、水彩《聖西西莉亞》、多幅《莎樂美》素描手稿以及在夏塞里奧病逝之後，莫羅爲了追憶恩師所構思的《年輕人與死》，都能從中覓到德拉克洛瓦和夏塞里奧的痕跡。儘管如此，往展牆上一掛，莫羅的畫作你永遠不會認錯。這份高辨識度並不是取決於觀者的專業性，而是對美的敏銳度。凡看過莫羅畫作的，都忘不掉他筆下帶有夢幻與迷幻兼具的美。而這份獨一無二，也源自師承。

▲夏塞里奧畫作《阿波羅與達佛妮》手稿 作者供圖

一八九一年十月，時年六十五歲的莫羅被聘請爲巴黎美術學院的教授。身爲老師的莫羅在教學時始終遵循着一個原則：好的老師不是將所有學生都教成自己的「高仿複製品」，而是根據每個學生自身迥異的天賦，幫助他們發揮特長並建立自己獨特的繪畫語言。有如此開明的老師在求學期間給予指導，年輕的亨利・馬蒂斯和喬治・魯奧無疑是受益者。有傳言稱莫羅曾預言馬蒂斯會成爲一位將簡約畫法帶入這個世界的藝術家，並認爲魯奧會創作出充滿宗教精神的作品。通過《馬蒂斯和喬治・魯奧，五十年的友誼》特展中近百幅二人的作品足以看出，二人的藝術生涯印證了莫羅的預言。

邁進《馬蒂斯和喬治・魯奧，五十年的友誼》特展的第一主題展廳，除了撲面而來的醒目紫色展牆之外，你幾乎無法從二人早年的習作中找到未來的發展軌跡。在巴黎美術學院師從莫羅互爲同學的馬蒂斯和魯奧，還無法完全脫離老師的影響。二人早期作品相似度極高，區別在於，魯奧的色調與莫羅更接近，馬蒂斯作品中的結構堆積則有塞尚的味道。在馬蒂斯求學期間的家中，擺放着他購回的幾件鍾愛藝術品：一件羅丹的石膏像，一張高更的作品，一幅梵高的草稿，還有一張塞尚的《三浴者》。從塞尚的構圖和色彩中，馬蒂斯汲取了大量靈感，這也爲他日後走出自己的繪畫風格奠定了基礎。（中）

▲莫羅名作《監獄中的莎樂美》 作者供圖

你是誰，才可以遇見誰

游宇明

自由談

有句流行的話叫「你是誰，便可以遇見誰」，可見國人非常在乎自己周圍有些什麼人。

有兩則故事常被人掛在嘴邊：一則是關於張幼儀的，一則是有關蔡元培的。張幼儀與徐志摩兩人離婚之後，徐申如夫婦視前兒媳爲女兒，不僅爲她的留學提供經費，還劃出自己財產的三分之一，交給張幼儀掌管。張幼儀後來的婚姻也挺美滿。她在香港時，有一個租客蘇醫生，因爲欣賞她的淳樸、善良，愛上了她，在感情上一向被動的張幼儀頓時六神無主，她向哥哥討主意，哥哥言辭之間有阻止的意思，不得已，她求助於兒子，兒子旗幟鮮明地選擇了支持，最後有情人終成眷屬，張幼儀因此過了二十年幸福、快樂的愛情生活。一九三六年，蔡元培七十大壽，因爲不忍心讓老領導暮年四處漂泊，北京大學的舊師生胡適、蔣夢麟、王星拱、羅家倫等人策劃了一個「獻屋祝壽」的活動，他們計劃大家集資，爲蔡元培新建一座房子，供他在暮年棲身，也讓他衆多的書籍有個歸宿。此事雖然因爲戰爭沒有辦成，但蔡元培內心的感動可想而知。

然而，只要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張幼儀、蔡元培之所以能遇到對他這樣好的人，與他們各自做人有極大關係。換句話說，就是在「遇見誰」之前，這兩個人先做好了「你是誰」這一件事。

一對男女離了婚，彼此對對方及其家庭就不再負有任何責任，這是常識。然而，當年的老徐家似乎沒有張幼儀這個前兒媳就玩不轉。徐老太患了氣喘病，徐申如不找兒媳陸小曼，卻打電話讓張幼儀去照顧，張幼儀怕陸小曼有想法，說：「我離婚了，不應該插手家裏的事情。」徐申如卻堅持要她到場，說「你一定要馬上來家裏，家裏沒半個女人，我們不曉得怎麼辦」。徐志摩居然接過電話，理直氣壯地說：「我啥事也不會。她病得這麼重，我不懂醫藥方面的事情。」看到徐家確實需要自己，善良的張幼儀沒有計較自己受過的如黃河之水一樣多的委屈，一路小跑來到那個實際上已經不屬於她的家，給風燭殘年的前婆婆陪床，在其去世後上奔下跑地操持喪事。甚至幾年之後徐志摩不幸遇難，她也按徐家要求像個遺孀似地承擔起全部責任。晚年的徐申如孤身一人，與她同住，張幼儀又像女兒似的精心照顧……這樣的大好人，徐家給點財產、中年之後有個男人喜歡不是順理成章嗎？

再說蔡元培。蔡元培一生官運很好，做過教育總長、北大校長、大學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做教育總長、大學院長，他極力主張改革課程設置，以美育代宗教，爲爭取各級學校的正常撥款不懈努力；當北京大學校長，他大力推行現代大學制度，建立教授會、評議會，讓學校始終掌握在懂教育、能辦事的人手中；位居中央研究院院長，他四處搜羅優秀的研究人才，希望讓中研院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他一生廉潔，從不接受不義之財，以致手中沒有任何積蓄，他的受到崇敬與幫助也自然而然。

我這樣說，並非認爲「遇見誰」不重要。人是一種意志力薄弱的動物，再內心強大的人，如果周圍的環境充滿向下走的力量，時間長了，他也很可能沾滿壞習氣。相反，如果我們所處的環境是純潔、昂揚向上、充滿人性溫度的，就算一個人有點毛病，在他人的潛移默化下也可能慢慢變好，所謂「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只是我覺得任何環境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一個人品質好、才華橫溢，社會上那些善良、眞誠、出類拔萃的人就會欣賞你、爭相認識你，你「遇見」的一般都是好人、能人；一個人品行不端、不學無術，那些具有正能量的人就會排斥你甚至徹底唾棄你，你「遇見」的，往往是那些被正直的人所不齒的人渣。我們要長期做到遇對人，就必須在「你是誰」上狠下功夫，讓自己像磁鐵一樣牢牢吸住那些高尚或優秀的人。

畢竟，這個世界很少有不付出的得到。